

跨文化视域下对西方文明观念的反思¹

——评刘禾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席志武²

[摘要] 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全然抗拒到欣然接受的曲折历程。当西方中心的知识范式和文明观念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它自然也就构成了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一种认识基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一书，是一部体现集体智慧结晶的跨学科研究力作，它围绕着世界秩序如何形成、西方文明价值标准如何上升为一种“普世性”价值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考古学式”的深入论述。该书体现的全球性历史视野、跨文化的研究视域以及反思性的价值立场，对于我们今天反思自身的知识结构，构筑一种适应于当下“文化自信”语境下的文明话语体系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文明论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刘禾 跨文化视域

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与讨论，早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开始，所谓“睁眼看世界”，看到的正是西方殖民者凭借血与火而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它与华夏中心的“天下”秩序全然不同。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初次来华，这被史家描述为“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 and 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³，直接预示了之后两种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碰撞。挟裹着坚船利炮远道而来的西方强势文明，在对晚清政府的轮番痛击之后，让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了对于传统观念的信仰危机，他们因此不得不抛弃过去的我族中心主义观念，转而慢慢接受全新的全球世界观。对于当时的文人士夫而言，如何应对中西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更进一步说，该以怎样的文化心态去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这是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时代命题。严夷夏之防？援西入中？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诸如此类，基本上都涉及到一个中与西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中西之间一开始就不是对等的关系。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在当时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西方意味着现代、文明与进步，中国则意味着守旧、不开化和落后。这一点，却也正是西方国家在 19 世纪初年所建构出的一套关于世界文明等级的发展模式。其最为经典的表述，是将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时性差异，整齐划一地区分为不同的历时性的发展等级：文明

¹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 2016 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博士基金项目《文明等级论与〈新民丛报〉对于“新民”理想的构建》（16BJ19）阶段性成果。

² 【作者简介】：席志武（1985 年-），男，江西高安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报刊与文化。

³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三联书店，1993 年，第 1 页。

国（Civilized nations）指的是欧美基督教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多数亚洲国家，属于半文明国（Semi-civilized nations）或不开化的蒙昧国（Barbarian nations）；其余的人类，都是野蛮人（Savages）。在这里，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完全衍变成时间上的先进与落后问题。它所透射出“霸权”逻辑在今天已经被一些西方学者充分意识到，且做出了深刻的反思。¹但就当时而言，这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世界观念以及对于世界秩序的认识基础。

正因为如此，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费正清先生为领军人物的美国汉学家开始运用“冲击-回应”（stimuli-response）的研究范式来对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进行分析，如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就说，“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始于 19 世纪中叶。”²关于此，勒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1953）一书中预设出“历史与价值”、“情感与理智”的分析架构，他以梁启超为个案做了这样一番评述：“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务，对价值有一种理智上的任务，并且每个人都力求使这两种义务相一致。[……]梁启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³这种所谓的“冲击-回应”学说，体现出极为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它随后也遭遇到来自张灏（Hao Chang）、柯文（Paul A. Cohen）以及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等人的批判性反思，“中国中心观”由此而起，后者强调从中国入手、用中国内在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

不论是“冲击-回应”，还是“中国中心”，实际上都还是在围绕着近代中国人该以怎样的文化心态去应对外来文明的挑战问题。然而，接踵而至的另一个更为可怕的问题还在于，外来强势的西方文明通过它们的殖民扩张与文化渗透，已经建构完成了具普遍意义的世界秩序，这完全不存在中国人愿不愿意或者接不接受的问题。从历史事实来看，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屈辱抗争的历史。潘光旦在《自由之路》中这样说到，“一部近代史简直就是一部面子毁灭史。这一种面子倒并不是小面子，而是一种再大没有的面子，因为几番挫败的结果，根本暴露了我们内在的弱点，我们政治的痼疾、文化的症结、以及民族的种种恶劣根性，从此和盘托出，再也掩饰不来。”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治痼疾、文化症结、民族的劣根性……等诸种“弱点”，都是在对于西方文明本身的借镜下而比较形成的。换句话说，当我们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时，我们实际上在无形当中已经认同并接受了一种“价值标准”，这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级观念。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中所言的

¹ 如英国地理学家多琳·梅西有如下分析：“我们看待全球化过程的方式就是，将空间变成时间。举例来说，我们经常用一个术语说，我们是‘发达’（develoed）国家；而那些落后于我们的国家，就是‘发展中’（developing）国家。当你这么一说你就明白，它们是‘欠发达’（underdeveloped）国家。这么做其实就已经将这些国家之间的同时代差异转换成了一个单一的线性历史了。”——见《多琳·梅西论空间》（席志武译），《美育学刊》2015年第3期。

²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861.

³ [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⁴ 潘光旦：《自由之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66页。

“器物上”、“制度上”和“文化上”的三种“感觉不足”，都是在与西方的比照中所形成的。对此，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aith）在《人文类型》（*Human Types*）一书中也有深刻揭示，他说：“对今天产生更重要影响的和更激烈的文化变迁发生在复杂的文明社会和不发达社会的接触中，在历史上，这类例子本已不少，例如中国文明对于和它接壤的‘蛮夷’的影响，罗马文明对于我们自己的祖先的影响，伊斯兰教规对于近东及北非沙漠中的影响都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在一种社会制度上增加一些新的项目，而社会制度的主要结构仍保持原来的形式，这是生活方式和信仰的革命，是把新的统治和法律的制度强加于一个社会。而且，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往往是被强迫接受的。”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不对等的文明关系当中，近代中国接受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又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样是“被强迫接受的”。

那么，“被迫接受的”世界秩序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几乎构成了《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一书写作的逻辑起点，其开篇第一句话就这样说：“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从哪里来的？”（第1页）该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主编，是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策划和发起的一项跨学科研究，刘禾、唐晓峰、郭双林、梁展、孟悦、刘大先等十几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围绕着世界秩序如何形成、西方文明价值标准如何上升为一种“普世性”标准等问题，对过去五百余年的全球发展史进行了“考古学式”的深入论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五百余年的世界文明史，就是一部欧洲人的殖民史和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发展历史。肇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在一定意义上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精神视野，欧洲殖民者据此凭借着血与火的征服和掠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套严整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在《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一文中，作者深刻指出，“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的大发现，更准确一点说，是欧洲人自身文明的大发现。”（第19页）这种“发现”，它首先就是“欧洲人文化认同与自我标榜的标记”，²欧洲人据此开始按照自身标准确立人类发展模式的文明等级，并建构出一套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149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署双边条约《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它开启了“世界秩序”的大幕，同时也预示了之后五百余年世界发展的整体格局。

从发生学视角对“今天的世界秩序”做“考古学式”的回溯，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世界秩序以及未来的文明走向。以全球史的眼光来看，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其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就在于他们通过暴力和文化手段成功地对世界各地进行了殖民征服，并确立了一套严密的文明话语体系。“欧洲中心主义”因此获得了它的合法性。“欧美人塑造的文明等级含有一套由低到高的排列标准”，这种标准几经变迁，“被写进了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形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第7页）这种

1 [英]雷蒙德·弗思：《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1页。

2 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

知识基础，随着西方中心的确立，随后成为其他国家认识世界、反观自身的基础，进而演变为全球性的历史共识。它不仅体现于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观念中，如作者指出，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背后隐含着“文明与野蛮等级化的逻辑理路乃至文明史叙述结构中的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第 212 页）。同时也具体体现在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当中，“在康有为那里，殖民主义的知识形式自觉地成为其建构民族认同的思想框架，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框架，一个精神上被殖民的个体和民族从此便不断面临着迷失自我的危险。”（第 161 页）《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一书所论的当然不止于此，它所论及的范围，“包括学术建制、媒体技术、地球版图、视觉展示、科学技术、国际法，以及形形色色的书写行为、翻译行为和学术行为”（第 2-3 页），该书以跨学科的文化视野以及富于历史感的反思性眼光对文明等级论作了详细考察，在这番考察当中，作者为我们揭示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出现对于传统文明的认同与信仰危机的同时，却认同并接受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观念和知识范式。

应该说，本书的写作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我们呈现了全球性的历史视野与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它最为重要的价值，是始终都在强调一种人文学者应具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如“序言”中所明确的：“对于当代人文学者来说，反省过去几百年的知识结构，探索新的历史意识，当是责无旁贷。”（第 14 页）这种“舍我其谁”历史担当，对过去知识结构的深刻“反省”，以及对于未来历史意识的“探索”，笔者将其概括为是一种反思性的价值立场。这可能是本书最值得关注的內容。反思（Reflexive），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指的是行为者以人们关于具体事物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反身思之，反复思之，力求实现思想本身的自觉。有学者指出，“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人类的反思活动，也就是超越了经验观察和具体感知，形成抽象的概念和判断的过程。”¹不过，“反思”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过去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深层次认知，它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反思者对自我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高度的警惕与自觉。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反思”不仅仅需要对分析工具进行反思，还要求把自己作为反思的对象，“想要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建构的对象的。”²质言之，“反思”要求“反思者”对自己的一种“自反思”。如前所述，《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始终都围绕着“今天的世界秩序从哪里来的？”这一问题进行追问。这种追问不仅仅指向于过去五百余年的全球史，它还指向于当下我们对此一问题的“忽视”：“文明等级论——简称文明论——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究其主因，还是因为它在许多学科里充当着‘政治无意识’的角色。[……]忽略和遗忘，恰恰突出了文明等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无意识’的强大功能。它像空气一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第 5 页）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不断地向西方求取救国救民的“真

¹ 江怡：《西方哲学》，见从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

² [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经”，始终都保持着对于西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的“无意识”的接受，这也在事实层面形成了一种西方的“文化霸权”，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也一直都处于“臣服”和“下等”地位，无疑，这严重损害了我们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觉，更遑论“文化自信”。本书作者从历史发生学角度对现存世界秩序进行追问，无疑将进一步对我们的知识范式作出反思，这在强调“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今天来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体现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刘禾等十一位作者立足于过去五百余年的全球史，共同发起了一场对于文明论和殖民史学的深刻检讨。这种最富于历史感与当下价值的研究，它的突出意义，是指向于当下乃至未来的世界秩序重建问题。作者指出，“放眼全球，文明论于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潜移默化，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国，它作为一个内在逻辑，依然在推动着今天的发展主义；在欧美国家，它更是屡屡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导火索。”（第 13 页）“文明和野蛮二元对抗的等级化观念、进步与落后的意识形态化衡量标准，至今依然散见于我们的一般知识当中，不断制造着人与人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歧视和仇恨，严重影响着我们和平共生之 21 世纪全新的政治文化体制的建立。”（第 234 页）尽管如此，在当今时代，全球化仍在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¹无论是英国退出欧盟、叙利亚难民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还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等等，都不能不说直接关系到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其价值旨向性可谓是相当明显，它指向于一种平等、自由、开放、多元、融合的世界政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今天的世界秩序从哪里来”的反思，终极意义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探讨“未来的世界秩序到哪里去”这样的现实性问题。它对于我们在“文化自信”语境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文化的世界作用亦有着相当大的启发性意义。

¹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 月 18 日。